

单枪匹马的马寅初



2005年1月6日，中国人口达到13亿（不包括港澳台约3000万），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。据预测到2040年，中国人口将达16.5至17亿。过去有科学家测算，根据我国的自然资源和地

域环境，只能养活16亿人口。如此，到本世纪中叶，中国人口已呈超饱和状态。

上书中央提出控制人口

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，人口约为4.5亿，到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，已突破6亿大关。1979年夏，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为马寅初平反，他含着眼泪说“当年毛主席要肯听马老一句话，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突破10亿大关啊！批错一个人，增加几亿人，我们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。”

上世纪50年代初，马寅初回浙江老家研究人口问题，随后给周总理写了一份报告——“人口问题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，必须引起重视，早为之图”，建议全国进行人口普查并提出了控制人口的意见。但毛泽东持不同看法，多次批评马寅初等学者“杞人忧天”，有的地方还在号召学习苏联的“母亲英雄”，对多生育妇女进行奖励。

1954年，马老以人大代表身份第三次回到浙江农村调查，在调查报告中写道“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！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！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！”三个不得了，表达了马老的忧心如焚。1957年春，在中南海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，当着毛泽东的面，马老再次提出人口问题。毛泽东听后笑了说：“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，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嘛！”马老以为有了结果，加紧人口问题的研究写作，完成了他的名著《新人口论》，1957年6月提交人大一届四次会议。7月5日《人民日报》整版刊登，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。

为了国家和真理决不屈服

不久康生首先发难，用化名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文章，说有人借人口问题搞政治阴谋，这完全是右派进攻。6月1日，《红旗》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《介绍一个合作社》的文章，针对“中国人口多，难于前进”的“反动观点”，提出“人多是好事不是坏事，除了党的领导之外，6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。人多议论多，热情高，干劲大！”

随着“反右”运动的深入，全国主要报刊纷纷发表批判马寅初的文章，达200多篇，给他扣了三顶大帽子：宣传马尔萨斯主义，反对“人多好办事”的唯物史观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。马老义无反顾，公开发表文章宣称：“为了国家和真理，我不怕孤立，不怕批斗，不怕冷水浇，不怕油锅炸，不怕撤职坐牢，更不怕死。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。”

1958年对马寅初的批判，已从学术范畴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。1959年夏，马老随人大视察团赴外地视察，

目睹大跃进、人民公社、公共食堂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祸，感到痛心疾首，未免发些牢骚。回京不久，周总理代表毛泽东、党中央找他谈话，要他作检讨。但谈来谈去谈不拢。最后周总理几乎用哀求的口吻请他检讨。马老明白不到万不得已，总理不会说出这样的话，但要他违心作检讨，也实在办不到。他沉思良久，最后迸出两句话：“吾爱吾友，吾更爱真理。为了国家和真理，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！”几天后，马老写了《重申我的请求》，文中严正声明：“我虽年近八十，明知寡不敌众，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，直到战死为止，决不向专以力压服、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！”

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后，指示秘书：“反右斗争已取得全面胜利，马寅初仍然向我们下战表，可说是茅坑里石头，又臭又硬，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，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，请他下马。”1959年12月，上万张大字报贴满了北大校园，甚至马老的院子里、书房里和卧室里都贴满了大字报。小会批也变成了大会斗。“彻底批判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——《新人口论》！”、“打倒中国的马尔萨斯——马寅初！”“马寅初不投降，就叫他灭亡！”这些口号声响彻北大校园。

1960年1月3日，马老被迫搬出北大燕园，遭到了软禁，被冷藏了20年。

实践已经证明，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是正确的。马寅初铮铮铁骨，为坚持真理而威武不屈、万死不辞的崇高精神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，将传世于中华民族千秋万代。

（文 / 杨勤民 据《炎黄春秋》）

孙中山一生娶了几个女人？在他公开的传记中，只承认两位，一位是卢夫人（卢慕贞）、一位是宋夫人（宋庆龄）。其实孙中山还有一位妾叫陈粹芬，在孙中山家的族谱里有详细的介绍。此外孙中山还有一位日本籍的秘密夫人，孙家家谱中没有作记载。

原配卢慕贞夫人

1885年，孙中山奉父母之命与同乡卢耀显之女卢慕贞结婚。结婚三个月后，孙中山便于同年8月，离开家乡再赴香港中央书院复学。他埋首书海，只有在假期才回故乡团聚，对过门后才认识的夫人，开始时夫妻的感情并不深厚。每逢回乡，对言语不多的卢慕贞相敬如宾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对卢慕贞加深了了解，渐为她孝顺、勤劳和贤惠的行为所感动。卢慕贞与孙中山并非自由恋爱结婚，但也婚姻美满，生育下了子女孙科、孙延和孙琬三人。1915年，孙中山为娶宋庆龄，与卢慕贞协议离婚。卢氏晚年定居于澳门，1952年去世。

侧室陈粹芬

陈粹芬（1873-1960），是孙中山的革命战友。1891年的一天，19岁的陈粹芬在屯门基督教堂（美国纪慎会）与孙中山相识。初次相见，孙中山即向她表示要效法洪秀全、石达开推翻清朝。出身贫困的陈粹芬深为孙中山的豪言壮语所感动，崇拜之情油然而生，也立志参加革命。不久，志同道合便使孙中山和陈粹芬结成革命伴侣。

自1891年起，陈粹芬追随孙中山，足迹遍及日本、

在众人注视下

他在世界之巅慢慢死去

34岁的戴维·夏普出生于英国，大学时代开始迷上了登山。2006年，夏普辞去了他在英国国防部的工作，与一家名为“亚洲徒步”的登山者服务公司签约，开始投入到攀登珠穆朗玛峰中去。夏普的目标是独自登顶。

5月13日，夏普和其他登山者一道转移到海拔8400米处的营地，准备登顶。除夏普外，其他登山者大都是一家名为“喜马拉雅体验”的登山者服务公司的客户。晚11时30分左右，夏普带上氧气瓶，开始独自登顶。一位名叫比尔·克鲁斯的向导后来回忆说，14日凌晨2时左右，他在登顶途中遇到了夏普；当他于14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从峰顶返回时，在海拔8750米处再度遇到了夏普，那里距离峰顶的垂直距离仅有约100米。克鲁斯提醒夏普“要当心”，然后继续下撤。他猜想，夏普可能于14日下午2时30分左右登顶成功。然而，他不知道此时夏普的处境非常危险，他已持续攀登了10多个小时，携带的氧气消耗殆尽，体力严重透支，返回海拔8400米左右的营地对他来说已成为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。精疲力竭的夏普在一处被称为“绿靴子凹洞”的大岩石后停了下来。那里是10年前一名印度登山者的葬身之处——他所穿的绿靴子露在冰雪之外，清晰

新马一带，是孙中山倡导革命初期的亲密伴侣。孙中山在日本流亡期间，她做他的联络员，掩护革命同志，在孙中山周围待了十几年。后来因患肺结核，怕传染给孙中山而离开。

日本籍的秘密夫人

孙中山的日本籍夫人叫大月薰。大月薰的父亲原是和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商人，孙中山因藏匿在大月薰家里而与大月薰相识相爱，1902年结婚，当时大月薰还只是横滨高中女中的学生，年仅15岁。不久，孙中山独自前往东南亚及美国，于1905年回到日本看妻子，1906年他们的女儿出生前，孙中山因事离开日本，从此再也没有回来。

夫人宋庆龄

1913年，宋庆龄从美国毕业后，于8月29日抵达日本横滨，第二天就由父亲和姐姐陪着去拜访孙中山，这是宋庆龄成年后首次会晤她所仰慕的革命家。1914年9月，宋庆龄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，并与他产生感情，主动表示爱慕之意。宋庆龄父母得悉后，坚决反对他们的婚姻。1915年6月，孙中山将原配从澳门接到日本办理离婚手续。10月24日，宋庆龄来到日本，第二天上午即在日本律师和田家中办理结婚手续，孙中山49岁，宋庆龄22岁。当天下午在日本友人庄吉家举办婚礼，到场致贺的中国人只有少数几人。

(据《炎黄纵横》)

孙中山一生中四个妻子

可见，那里因此被称为“绿靴子凹洞”。

几小时后，又一批登山者向峰顶进发。14日午夜时分，两名土耳其登山者和向导抵达“绿靴子凹洞”。他们回忆说，夏普当时正坐在那名印度遇难者旁边，“看上去正忙着整理背包”。十几分钟后，另一组土耳其登山者到达“绿靴子凹洞”，他们认为夏普已经死了，于是继续前进。15日凌晨1时左右，“喜马拉雅体验”公司的向导马克·伍德沃德和3名登山者抵达“绿靴子凹洞”，他们看到夏普“还活着”，但“已经无法救治”，便继续向顶峰攀登。7时，认为夏普已经死亡的那组土耳其登山者成功登顶后下撤，再度经过夏普身旁时，一名叫塞尔汗·波坎的登山者惊恐地发现夏普的胳膊还在动。波坎通过对讲机向救援队呼救之后，就陪同患病的妻子继续下山。然而，救援队在前一天已实施过一次救援，无力再次进行救援。9时25分，黎巴嫩登山者马克斯·查亚登顶成功返回时发现了夏普，他看到夏普此时“还活着，但是昏迷不醒”。查亚联系上了“喜马拉雅体验”公司的负责人拉塞尔·布莱斯。布莱斯说，当时“他的两个客户在下山途中遇到了严重困难，没有额外的人手和氧气设备去营救夏普”。随后，登顶成功返回的澳大利亚登山者鲍勃·凯利浦等人再度来到夏普身旁，他们已从对讲机中听到了查亚与布莱斯的通话，认为夏普“无法救治”，于是继续下山。11时45分，一名叫弗巴的向导和一名土耳其登山者从峰顶返回时看到了夏普，他们给夏普吸了一些氧气，把他从凹洞里拖出来，放在阳光能够照射到的地方，然后离开。

5月16日，一个韩国登山队在登顶过程中看到了夏普。但此时，夏普已经死亡。

夏普的死在登山界和媒体中引发了激烈争论。

很多人指责那些从夏普身边经过的登山者“为了登顶而放弃救人”，指责拉塞尔·布莱斯的服务公司“见利忘义”。“人们至少应该尝试营救夏普，哪怕只有一次。生命的价值远远大于登顶”。也有人批评为夏普提供服务的“亚洲徒步”公司“极端不负责任”，而夏普本人坚持独自登顶，对自身的生命也“太过轻视”。

那些从夏普身边经过的登山者和布莱斯则辩称，他们是在断定夏普“无法救治”的情况下才放弃的。在那种情况下对其进行无谓的营救，只能搭上更多人的生命。

对于外界的争论，夏普的家人没有发表看法。2006年6月，当拉塞尔·布莱斯赴伦敦，把夏普的遗物交给他的父母时，两位老人对他表达了谢意，并感谢他“没有为了营救儿子而把其他人置于险境”。

(文/陶蹊据《青年参考》)

